

莫迪亚诺：巴黎德占时期“记忆”艺术及其 现代书写意义

——从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开去

钱林森

在这次给我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提及上次的世界大战：“揭示了法国被纳粹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和其他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我是战争的孩子。更准确地说，因我出生在巴黎，我是要感谢这个被纳粹占领的巴黎给我出生地。

……对我来说被占领的巴黎是一个创世之夜，我就是从那黑夜里生出来的。这个巴黎从来就没有停止对我的追踪和纠缠，而我的一本本小说就常常沐浴在它的隐晦光线里。^[1]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一、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话题

瑞典学院18位院士于2014年9月9日投票决定，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谁也没有料到的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使之成为摘取这枚顶级世界文学桂冠的又一位法国作家，使法兰西文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

[1] Patrick Modiano, 2014,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coll. «Blanche», 2015 (ISBN 978-07-01906-3). 中文参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演讲词”，2014年12月7日于瑞典学院，斯德哥尔摩，陈迈平翻译，载香港《明报》。

来，获取这一殊荣最多的国别文学，雄踞榜首。评奖结果一揭晓，便在各媒体、新闻界、出版界引起一片惊呼和轰动，使东西方文学研究界、一些专业人士和广大受众，也深受“冲击”，都感到有点“疑惑”、“出乎意料”：在本届诺奖投票前，据媒体报道、爆料，呼声最高的是非洲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Thiogo）、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拉娜·亚拉瑟维琦（Svetlana Alexievitch）和东亚日本六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法国小说家莫迪亚诺何以能“突围”并脱颖而出的呢？这就不免让人颇感“意外”与“奇怪”。但这一结果，在中法文学圈内的资深学者和瑞典学院院士们看来，却毫不为怪，他们认为，这纯系法兰西文学的传统魅力、影响力所致，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创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法国文学一直保持着这种独特魅力和文学大国的影响，优秀作家层出不穷。莫迪亚诺荣膺诺奖触发出热议和深思的话题是：法国作家何以始终保持着这种经久不衰的文学创作魔力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而每每在享有崇高国际声望、极具竞争性的诺贝尔文学奖评比中屡屡夺魁？这一点，只需我们认真读一读诺奖新主莫迪亚诺的作品，再比照先他而相继获此奖的其他14位法国同胞的创作，稍加审视和考量一下，就不难发现，他们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创造寄托对人类社会进步、对人类文明和人性自身深重的忧患感和责任感，鲜明地展现了作者作为时代精神良知的思想者、知识分子对艺术和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深刻伦理关切、历史担当与责任心。可以说，这就是法兰西文学特有的文学魅力与美丽和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也是一代代法国作家得以永葆创作魔力和产生巨大国际影响力的根由所在。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引发出的话题，激起普世的惊异、热议，自然也吸引了我国比较文学界、外国文学研究界和跨文化研究者的关注。是年深秋，当这个话题不断升温、趋热之际，正值笔者大病初愈、居室养息时期，适时读到了报载相关信息、文章，又恰逢老友、瑞典著名文学翻译家陈迈平先生再访南京大学，11月2日电话相邀聚面叙旧、访谈。因得迈平君引荐而有幸结识一道来访的贵宾，瑞典学院资深院士、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贺拉斯·恩道尔（Horace Engdal）先生，笔者便乘兴以诺奖新主莫迪亚诺的热议话题，在聚谈晚餐的现场求教于这位资深、博学的权威院士，彼此相谈甚欢。

笔者从与贺拉斯院士首次在宁晤面畅谈，至他返斯德哥尔摩后数度文字交流回答中，方才真切地了解到，莫氏获诺奖的缘由、结局及由此而引出的此次诺奖热门话题，

并非如新闻媒体所炒作的那样“扑朔迷离”与“诡异难测”，也非如公众所感觉的这般“意外”与“困惑”，一切进程与结果都如此清晰、透明，顺理成章。贺拉斯院士向我们披露，莫迪亚诺荣获本届诺奖，是瑞典学院按学院章程惯例，先由诺奖五人评委对包括莫氏在内的最后5名候选者的作品进行长时间跟踪阅读、评价、讨论之后，再由学院全体院士投票的最终决定。“最后一步并不难，我们的取向已很清楚了。”他说，“不过，这次学院是少有的一致——绝大多数票赞成，学院成员之间没有公开争论”。他告诉我们，诺奖评委成员每个人都会读法语，他一直读莫迪亚诺的法语原版书，他作为瑞典学院前常任秘书、诺奖5位评委现任秘书，读莫迪亚诺已经四十余年了，几乎读完了作者的所有作品，莫氏之作，“柔和的节奏和淡淡的失落感十分迷人”。他认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选择莫迪亚诺，“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们首先不妨选录笔者数度问教于贺拉斯院士的双向交流、互动的几段文字，特载于此，仅供本刊读者参阅：

钱林森：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选择莫迪亚诺？而不是某些呼声最高的作家，如媒体一再爆料的日本村上春树等作家呢？

贺拉斯：由于某些候选人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人们有时会形成这样一种观感，即某位作家当年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不会获奖。这实在是一个误解。没有作家不会获奖。把奖项授予莫迪亚诺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您名单上的其他作家。这只是因为瑞典皇家学院（不只是评选委员会，还包括所有的18位学院成员）一致决定莫迪亚诺作为一名小说家，其作品具有独一无二的魅力。为什么授给莫迪亚诺诺奖的依据，已通过颁奖声明之后的简短评语得到了宣示，而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授奖词^[1]也很能说明问题。我得建议你们好好读一读这些文字，对于学院而言，很少用其他方式来向社会公众证明这种选择的合理性。

钱林森：据我所知，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界、外国文学研究界和广大读者，多半没有料到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又落到法国作家之手，没有想到的是，获取这一殊荣的法国人，竟是20世纪末中法学界所举证的“新寓言派”小说家莫迪亚诺，您在投票前想到了吗？

贺拉斯：瑞典批评家从未使用过“新寓言派”这个名称，对我来说这个名称也过

[1] 莫迪亚诺被诺贝尔文学奖选中颁奖声明的简短评语和随后颁奖典礼的颁奖词是：“他用记忆的艺术，揭示了最难捉摸的人类命运和法国被纳粹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

于武断。的确，图尔尼埃是寓言故事的创造者，而勒克莱齐奥有些时候则更像是一位浪漫派型的史诗作者。但莫迪亚诺却毫无疑问开创了个人神话的传统，而这一神话往往以揭开其所生活的城市真实面的形式来得到展现。这三位作家的差别不可以以道里计，完全无法用“新寓言派”这一模糊的批评概念进行统摄。新小说派，在他们那个时代，代表了叙事技巧变革的共同追求。而图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之间不存在这样的一般共性。

钱林森：不少读过莫迪亚诺作品的读者或评论家都说，他的作品自我重复实在厉害，只需选择一、两本代表作读读即可，没有必要读完其全部作品。莫氏一生似乎就在写一本书，您读莫迪亚诺是否也有同感？

贺拉斯：从莫迪亚诺 1975 年完成《凄凉别墅》算起，他此后的小说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而他早期的作品则略有差异。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在精读完他的一部作品之后，就可以把他的其他作品放在一边。他的小说就像亲姐妹一样，在基因源流上大致相同，却有着不同的面容和各异的情感。同样，莫迪亚诺小说的总体氛围也因叙事者从一个年轻人变作了中年人或老者而发生了改变。

钱林森：您读完莫迪亚诺的全部作品了吗？您是通过法文原版还是瑞典译本读的？就您个人喜好，您最喜欢、最看重的是他的哪几部作品？

贺拉斯：当然，我读过莫迪亚诺的所有小说。学院评委们也要求评审委员读完年度候选人名单上 5 位候选人的全部作品，从而为接下去的评选讨论做好准备。从我能够熟练阅读法文起，迄今已经四十余年了，我所接触的一直是莫迪亚诺的法文原书原版。我最喜欢的是他较早的《凄凉别墅》（1975 年）和较晚的《夜草》（2013 年）。《凄凉别墅》是部非常微妙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和《暗铺街》很像，对于初读者来说也许是个更好的选择。莫迪亚诺所有作品通俗易懂，无须是文学专家也能读有所得。他的语言简单、清晰、凝练，他的情感能触及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

钱林森：此次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受到瑞典学院的特别看重，出人意料地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以致法国人始终稳居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榜首。你们依据的是什么标准？

贺拉斯：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样的统计并没有什么意义。在诺贝尔最后的遗愿中，他不但提出要设立诺贝尔奖，还这样明确陈述道：“我由衷希望在评奖的过程中不要因候选人的国籍和民族属性而予以特殊考虑。”我们的评奖标准是基于当代文学批评的

正当的美学原则。我们并没有要寻找某种独一无二的“诺贝尔特质”。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年生于巴黎郊外布洛涅-比扬古地区，父亲是犹太金融企业家，母亲是比利时演员。莫迪亚诺的小说作品很多，获得过很多文学奖项。1968年（19岁）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La Place de l'étoile*）获罗歇·尼米埃奖，一举成名，翌年出版《夜巡》（*Le ronde de nuit*, 1969）获费奈隆奖，便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而成为熠熠闪光的文坛新星。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先后发表了三十多部小说，其中的《环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1972）、《暗铺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1978）还分别为他赢得法国最高的文学大奖法兰西学院奖和龚古尔奖。2010年的《地平线》（*L'Horizon*）获得了西蒙娜和奇诺·德尔杜卡基金会之世界奖。2014年，莫迪亚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本届诺奖新主，确立了他作为法国和世界文学大家的显赫地位。

二、“莫迪亚内斯克”风韵的当代普鲁斯特

瑞典学院院士们“慧眼识珠”，本着他们所尊奉的诺贝尔文学奖设奖宗旨和美学原则，力排新闻媒体的种种议论与猜测，出乎意料地将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与此同时，还授给他更具本人个性特质、新颖别致的关键词“莫迪亚内斯克”（*modiaesque*，即“莫迪亚诺式的”），一如两年前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诺奖的同时，奖给莫言一枚新鲜独异的“幻觉现实主义”（*réalisme hallucinant*），以彰显他们所尊奉的诺贝尔文学奖至高的美学准则，高度赞誉中法这两位当代小说家独自创造的、风格各异而崭新的文学世界。何谓“莫迪亚内斯克”？从2014年秋瑞典学院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奖项归属时的短暂评语和颁奖典礼上的奖授词来看，是指诺奖新主法国小说大家莫迪亚诺独特的个人气质和文学风格，是莫迪亚诺的记忆艺术的创作风格。具体地说，就是指作者创作的系列小说作品在表现主题上“前后呼应”，且总是相同事物的变奏，包括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的巧妙变奏，它们无不关涉着作品中主人公的过去、记忆、失忆、身份、失落、寻找与探寻。从其系列小说的故事背景、整体构架、主题安排、人物设置，及其思想艺术的整体开发而论，确实已形成了属于作者本人个性化、独具特色的“莫迪亚内斯克”风格，这是“慧眼识珠”的瑞典18位院士通过讨论投票最终决定，授予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的特别重要而关键的理由，即关键词。

莫迪亚诺这一出众的艺术创新风格，瑞典学院颁发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确实是这样着重地强调着的：本届诺奖得主善于运用“记忆的艺术”揭示了“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和“法国被纳粹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瑞典学院终身评委兼常务秘书恩格朗先生（Peter Englund）也随即在斯德哥尔摩一次电视采访中向世界公众庄重宣称“莫迪亚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将其“记忆的艺术”和法国前驱大师普鲁斯特联系在一起，称赞莫迪亚诺的小说擅长表现这个“记忆”的艺术，其作品在主题上“前后呼应”，且“总是相同事物的变奏，关乎记忆、失落、身份、寻找”。这就直接引发出了当今东西方知识界的众多思考与热议。随之不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主席佩尔·韦斯特柏格（Per Wastberg）和资深评委贺拉斯院士接受广州《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采访，更具体细致地涉及莫迪亚诺的小说风格创新和获奖缘由，两位均不约而同地称曰，此次诺奖归属的评选结果和奖项理由是瑞典学院少有的的一致。“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一样，莫迪亚诺是现今法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他的三十多部作品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独特世界。”莫迪亚诺作品主要写的是纳粹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他的主人公通常是无家可归的人。“他确实会写同样的、已经出现过的议题，场景大部分都设在巴黎。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重复，他用各种变奏来描绘一个主题。”^[1]瑞典学院诺奖评委会主要成员们这一难得的开放、明澈的具体指点，让中国读者清楚地看到，瑞典学院院士们是何等喜爱、推崇本年度诺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并将之与前驱普鲁斯特并举，赞誉他是人类文明转型时期的“又一个普鲁斯特”——当代“莫迪亚内斯克”风致的普鲁斯特，新时代书写“人类记忆”的伟大艺术家。笔者由此深切感到，他们对莫迪亚诺的文学世界之推崇与评价，确实触及到了当代知识界都应关注的、颇具普世意义的跨文化课题。因而也引起我这个上了年岁的法国文学文化爱好者的好奇与思考，不禁扪心自问：瑞典学院热心推崇莫迪亚诺，将他与普鲁斯特并举，是否因为这两位法国作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追忆”过去这一手法？即运用“记忆的艺术”来寻找自我、追忆自我的过去？

莫迪亚诺与普鲁斯特这两位作家的“记忆的艺术”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或存在何种根本的差异性？人们通常喜欢把莫迪亚诺比作当代的普鲁斯特，将两者显而易见的表面比照，我认为可能只会导向一种表象的认识与比较。试想，举凡研读过法国两位作家的圈内学人和读者，谁不知晓普鲁斯特用“追寻”、“记忆”艺术，谱写出了

[1] 《哪个作家是全球文学精英，绝不是秘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秘书同题问答》，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翻译喻冬宇、何艾琳、李宏宇，发自广州、斯德哥尔摩连线报道，2014年10月16日，见《南方周末》（2014诺贝尔专栏）。

脍炙人口的鸿篇巨制《追忆逝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中译又名《寻找失去的时间》), 莫迪亚诺用“追忆”“过去”的历史变奏, 写出了一部接一部的耐人寻味的小说系列? 普鲁斯特的巨作, 绵延悠长, 而莫迪亚诺的佳构却篇幅甚短, 伽利马出版社的福利奥(folio)袖珍本开本甚小, 排印得也很疏朗, 每一行大约只有十来个字, 莫氏收入这个丛书的最初几部小说, 仅占一二行的文句居绝大多数, 占三四行的文句已不多见, 三四行以上的则极为稀罕了。这与普鲁斯特的“长句”之作恰成鲜明的对照, 同样是伽利马出版社“七星丛书”的普氏《追忆逝水年华》版本, 一个句型往往要占排印得密密麻麻的一两页甚至三页, 这在莫迪亚诺笔下是绝对没有的, 莫氏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从句, 经常使用状语、补语与分词句, 这就使他的文句简练到了几乎是最大限度。这也是我们圈内学者皆知的方面。从两位作者使用语言的风格韵致看, 普鲁斯特的文笔隽永悠长, 莫迪亚诺则“简洁洗练”, 可以说是简练到极致, “颇有极简主义的风格, 在这一点上, 更接近于海明威的文风”, 这在圈内学者看来, 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是这样将莫迪亚诺、普鲁斯特并肩比较, 或许仅此而已。我们今天跨文化的探讨, 当然不能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据笔者主观揣摩, 瑞典学院将莫迪亚诺和普鲁斯特并举比较, 并热情赞誉莫氏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鲁斯特”, 恐怕不仅限于上述所引、所指、所知, 则或许另有新意, 更具深意。

诚然, 读懂、读通莫迪亚诺和普鲁斯特这两位“记忆艺术”前贤大家的作品, 对一般外国读者和学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一个跨文化知识积累、多样的审美能力、艺术素养的培育和提升过程, 这对与法国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中国读者来说绝非易事, 尤其像我等这辈上了年岁的门外汉来说更是如此。曾记得, 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两度赴巴黎游学、执教时期, 就试着拜读过这两位大家的作品, 并有幸应邀在普氏故乡参加过“普鲁斯特之友”国际学术研讨会、参观过作者的纪念馆, 对大师的生活和创作做过实地考察, 和普氏专家有过直面的讨教与探讨, 希冀有朝一日能走进大家的文学世界, 可惜皆因当时文化积累和审美素养缺少火候而与之擦肩而过, 失之交臂。时过境迁, 想不到2014年秋病中有幸结识瑞典学院贺拉斯院士, 又正逢莫迪亚诺荣膺诺奖的热议话题。笔者借着此一话题的热浪, 竟老兴勃发, 不服老, 再次试着重读了莫氏和其前驱普氏的主要小说文本, 与瑞典文学院贺拉斯院士等资深批评家交流、求教, 以期一窥法国这两位记忆艺术大家所建造的文学神殿的真实面貌, 领略他们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格。

三、莫迪亚诺：巴黎纳粹德占时期的“梦”与“忆”

莫迪亚诺笔下的小说世界是以德国纳粹占领巴黎时期为背景、为基点的，以这座被占领的城市的生活众生相为元素、为灵感的，这是小说作者自觉受纳、调动前驱大家普鲁斯特的记忆艺术而精心构建起来的新时期的文学世界。这一点，只要悉心研读过莫氏一些代表作品，便不难见出其充分的佐证：从作者出道成名的《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中文又译《环形大道》、《魔圈》），再到《暗店街》（中文又译《暗铺街》、《寻我记》）、《迷失的街区》（*Quartier Perdue*，中文又译《往事如烟》）或《青春咖啡馆》（*Dans le Café de La Jeunesse perdue*，直译为《迷失青春的咖啡馆》）等系列作品看，莫迪亚诺这个二次大战“战争的孩子”^[1]，“老都城”巴黎纳粹德占时期的孩子，他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无非是“老巴黎”的故事，是德占巴黎的“追梦”与“记忆”、“梦”与“忆”，是“老都城”的“解不开的谜”——解不开的巴黎“情结”，写的是一阕又一阕的“巴黎往事”、故土的乡愁。一言以蔽之，写的无非是生于斯、长于斯“老巴黎”的“往事”，是“巴黎梦”、“巴黎忆”，是德占巴黎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乡愁：消逝的岁月，说不完的惆怅，逮不住的韶光，生于这座被纳粹占领的城市，一切皆逝于斯、遗忘于斯、迷失于斯，流连而无果、回望、追寻、跟踪、查找，悉数登场。遥想小说作者莫迪亚诺当年在巴黎举步文坛时，真可谓如有我国学者所诗性想象的“出户独彷徨，还顾望旧乡”^[2]那种惆怅形象。

的确，读莫迪亚诺的作品，你会情不自禁地发问：“莫迪亚诺，您是谁啊？”依据我们中国学人单纯、粗浅的理解，莫迪亚诺难道不是一个“人间惆怅客”吗？他因其熟谙“记忆”的艺术来写作，成就超拔，而荣膺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诺奖评委权威人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鲁斯特”——“当代的普鲁斯特”。不过，我们认为，同为“记忆”，却大异其趣。普鲁斯特由一块小玛德莱娜蛋糕忆及往日点点滴滴重建起一整个栩栩如生且无比稳固的回忆（记忆）大厦。而出生于二次大战刚结束的莫迪亚诺，对战争并没有直接的记忆，有的只能是追寻，这也就奠定了他从写作伊始——从其处女作成名作《星形广场》开始，就用追寻来完成失败的身份重构的写作模式。普鲁斯特，当然是以别样的方式，他的记忆是柏格森的，而莫迪亚诺的记忆

[1] Patrick Modiano, 2014,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coll. «Blanche», 2015 (ISBN 978-07-01906-3). 中文参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演讲词》，2014年12月7日于瑞典学院，斯德哥尔摩，陈迈平翻译，载香港《明报》。

[2] 见叶莎《莫迪亚诺：我是人间惆怅客》，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8日“国际文化”版。

是弗洛伊德(?)的;普鲁斯特的记忆需要宏大叙事,而莫迪亚诺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只需要一个人走入迷宫。唯一相同的,是记忆的暧昧与需要重构的本质。我们知道,莫迪亚诺的文学生涯,始发于其童年时代,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我童年的一些生活片段为我日后的创作播撒了种子。”^[1]他写作的源动力肇始于对童年的无尽的追寻、追忆和疑问。他的童年源自疑窦丛生的另类世界,一如他后来自传体小说《缓刑》(Remise de Peine,1988)所描述的那样——童年“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身份没有归宿,就像一条没有铭牌的丧家犬。”——动荡的生活,寄居在父母朋友家中,而这些朋友又行事诡秘、过往成谜,一边在等待当演员的母亲,还有从事可疑勾当的父亲,同样可疑的还有父亲的过去和行踪,这一切皆因深陷在沦陷巴黎的泥沼中,父亲会数日、数周、数月杳无音信或者不来看他们,之后又把他们送往别的地方交托给别人照顾,充满着无尽的遗弃感、焦虑感……童年对他而言,便是神秘、疑团,是生命、存在的疑团,是身份无法确认的焦虑与暧昧,是解不开的“谜团”,无从认定真相,无从解开疑问,无从判定暧昧,无从揭开谜底。而他曾不止一次的这样重申:“洞开谜底的强烈愿望,这就给了我写作的欲望,好像写作和想象可以帮助我最终解开谜底,找到答案。”^[2](«... et de tenter de percer un mystère m'a donné l'envie d'écrire, comme si l'écriture et l'imaginaire pourraient m'aider à résoudre enfin ces énigmes et ces mystères.»)莫迪亚诺的创作生涯便由此而肇始、而举步的。

从1968年莫迪亚诺成名处女作《星形广场》到《夜巡》(1969)、《环城大道》(1972),再到《暗铺街》(1978)等,是莫氏出道成名的系列创作的代表作。我们读《星形广场》和随后的《夜巡》、《环城大道》发现,确证最初的这三部作品,组成了作者“追寻”“父辈三部曲”,即我们称之为的“抗战三部曲”,形成了并定格于小说家对于集体和个人记忆交织的“追寻”的创作模式。何以见得?我们知道,1945年才出生的莫迪亚诺没有亲历二次大战的生活经历,对战争并没有直接的记忆。他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和可能的第一手素材写出像《海的沉默》这样真切反映大战时期生活的作品。事实上,作者也无意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摄取具体生活场景,似乎只满足于借用这个德占纳粹时期的背景,借助于这一时期普通人所经受的那种典型的、窒息生存的重重压力,赋予其作品以象征的哲理寓意。^[3]而这种沉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挥之不去,

[1] Patrick Modiano, 2014,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coll. «Blanche», 2015 (ISBN 978-07-01906-3).

[2] Ibid.

[3] 参见柳鸣九著《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五十年代——新寓言派)》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依然像噩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集体记忆里。对二战硝烟刚消隐才出生于世的作者来说，这种生存焦虑的沉重压力和噩梦般的集体记忆，一直伴随着他整个动荡不安的童年，在他心灵深处和生命旅程中，烙上了终身不灭的印记。形诸作者的笔下，便铸成了莫迪亚诺这组“追寻父辈”三部曲的抗战小说独树一帜的风格：相似的角色、相似的情境、相似的纠结、相似的迷失与侦查，在这些相似中，又闪现着近似的寓意的哲理光辉和深邃的思想力量，构成了这位小说家出道10年后在当代法兰西文学中，乃至世界文学中最鲜明的标志与独特的魅力。

我们看到，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无不承受着生存绝境、身份不能确认的巨大压力，莫迪亚诺从德国占领时期支取来的象征性的压力，就压在他们身上。《星形广场》中的犹太人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在法西斯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惶惶然从法国躲避到以色列，最后在幻觉中被处决在巴黎的凯旋门前；《环城大道》中的犹太人父亲，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暗无天日的生活，甚至不敢与自己的儿子相认，最后仍然落入魔掌；《夜巡》中的青年主人公陷入法国特务的魔窟，在周围阴森恐怖的气氛下，他艰难的双重间谍生涯，使他的精神处于时时都有崩溃的危险边缘。在仔细审视了莫迪亚诺笔下人物的存在状态之后，我们就可逐渐接近作者的寓意。这些人物面对着黑沉沉的、看不见的压力与周遭那种令人恐怖的气氛，面对自己存在难以摆脱魔影这一可怕现实，他们无不感到自己缺少存在支撑点、存在栖息地的恐慌，无不具有一种寻求解脱、寻求慰藉、寻求落脚地与栖息处的迫切要求……于是母亲、父亲、祖国以及象征着母体祖国的护照与身份证，便成为这些人物向往的方向、追求的目标，成了他们想要找到的支撑点，但他们的这种向往与追求无一不遭到悲惨的失败：《星形广场》中的犹太青年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怀着扎根的意图，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最后以噩梦收场；《夜巡》中的“双料间谍”特鲁巴杜尔（他在抵抗运动中的代号叫叶巴勒公主）在严酷可怕的环境下，唯一能够慰藉的就是远在洛桑的妈妈，而要摆脱他所处的险境到那里去，却比登天还要难，他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触犯死亡，走上了殉道者自我毁灭的绝路才结束他两难的存在状态；《环城大道》中的儿子“我”，怀着深情，不畏艰难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但父亲却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只有伪造的“身份证”，他没有祖国，他还企望从儿子的一份中学毕业文凭中得到他的根基的确认，就像一个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莫迪亚诺笔下这一个个故事，一个个“老巴黎的往事”，就这样集中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即现实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悲剧。

还不止于此，莫迪亚诺继续深化自己的主题，在表现人物支撑点、栖息所的同时，

着力表现了人寻找自我的悲剧，他要往深处开掘，从而赋予作品更深刻的寓意。《夜巡》里那个双料间谍身陷于两个对立营垒的夹缝之中，疲于应对双重的压力，这种难堪的状态使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法西斯组织那边，他叫斯温·特鲁巴杜尔，在地下抵抗组织这边，他叫德·朗巴勒公主，他的自我究竟是可耻的特务还是潜伏的志士？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属性，然而，你掩卷之后能完全确定他自我的属性吗？寻找自我的悲剧，在此已初见端倪。同样，在《环城大道》中“父亲”完全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他既无真实姓名，也没有清清楚楚的经历，身上裹着一层暧昧的浓雾，而他这种自我的丧失，正是与他支撑点的丧失、栖息处的丧失紧密相关的。小说里的叙述者“我”力图替自己的父亲恢复自我，却遭到了失败。更耐人寻味的，而“我”本身也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人们称呼他的那个名字，仅仅是他在旅馆登记簿上的一个化名，他替父亲显现自我的努力归于失败，也就意味着，他寻根溯源、寻找自我的一切努力纯系徒劳，他将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至于《暗铺街》（中文又译《寻我记》），寻找自己的主题更推进到新的深度。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我：自己的真实姓名、生平经历、职业、工作、社会关系，他成了一个无根无底的人，一个没有本质、没有联系的飘忽的影子，一个其内容已完全消失泯灭的符号，而“私人侦探居伊·罗朗”这个符号仅仅是他偶然得到的，他真实的一切都已经被深深埋葬在浩瀚无边的人海深处，他要到这大海中去搜寻一段段已经散落的零星线索，其难处绝不亚于俄底修斯为了返回家乡而在海上漂流 10 年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莫迪亚诺就为我们创作了文学史家所说的“一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1]

莫迪亚诺是一位不断探索前行的小说家，继第一个“追寻父辈”三部曲后，延续使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完成了第二个三部曲，即我们所谓的跨越世纪的“迷失三部曲”^[2]：《迷失的街区》（1985）、《青春咖啡馆》（2007）和去年刚发表的《为了不迷失在街区》（*Pour que tu n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 2014）。在这三部作品中，我们读到的依旧是莫迪亚诺式的题材、主题与寓意的巧妙变奏。就以《青春咖啡馆》（*Dans le Café de La Jeunesse perdue*）而论，这无疑是一部有分量、有突破的描写神秘巴黎和迷失主题的作品，是一部富有魔力的力作。依照原作书名直译，中文应译为《迷失青春的咖啡馆》更确切，这更能准确地贴切原作主题和作者创作的旨意。小说写的是巴

[1] 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五十年代——新寓言派）》，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366页。

[2] 参见袁筱一《迷失：我们的存在方式》，载《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2014年10月15日。

黎咖啡馆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一家名叫孔岱的咖啡馆，主人公是一个迷人的名叫露姬（Louki）的22岁女子，她从哪里来？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生存经历？她的迷人光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她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故事就围绕这个“迷人”女子失踪展开。小说故事由孔岱咖啡馆的4个常客（叙述者），即巴黎一名大学生、一名私家侦探盖世里和露姬本人及她的情人罗兰，依次登场，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向读者娓娓讲述女主角露姬短暂、“迷人”的人生经历。小说作者一方面善于采纳侦探小说制造悬念、渲染神秘的元素，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运用居伊·德波^[1]的“漂浮”理念和“情境主义”的格调，造成一种“晓梦迷归路，云深不知处”的朦胧迷人而忧伤惆怅的情调，一如扉页题词所写：“在真实生活之旅的中途，我们被一缕缕绵长的愁绪包围，在挥霍青春的咖啡馆里，愁绪从那么多戏谑的和伤感的话语中流露出来。”^[2]使这部小说成为“最令人心碎的作品”之一。作品中一如既往地充满着调查与跟踪、回忆与求证、找不到答案的疑问。依然是记忆和追寻，是逃离和消失的秘密，是生存境遇的况味，让我们一下就能认出是莫迪亚诺式的标记。此处露姬的故事并不发生在二战的忧郁的背景下，如《星形广场》、《夜巡》、《暗店街》那样，但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依旧是人之生存状况的图景、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写的无外是逃离、追寻、消失、追踪，揭示的总是人生栖息的生存况味、人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寓意的是形而上的人之存在的命定性、渺小性、短暂性、悲怆性的深邃哲理。莫迪亚诺笔下的人物总是在逃离、消失、迷失、消逝：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再不然还可以自己的方式，露姬的另类方式，仿佛淡然得、坦然得不想给这个世界添麻烦似的。究其原因或理由之借口竟然还是《星形广场》里的“我累了”，虽然作品所依托的环境可以改变。在迷惘的咖啡馆里，不同线索编织完成的露姬，也唯有用“我累了”给个交代。进入新世纪之后，莫迪亚诺就这样以“前后呼应”的方式完成了“迷失三部曲”。或许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和意义上，我们看到，这位不断求索的艺术家创造了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开创了文学创造的新景观、新局面，获致一种新的深度和高度，这就引起了举世的注目，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享有世界声誉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高度重视，齐声一致地赞誉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鲁斯特”，新世纪书写人类命运和“记忆”的伟大艺术家。

[1] 居伊·德波（1930—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国际情境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新影像先锋之父”、实验电影大师，其代表作为《景观社会》，他的思想曾对1968年的法国青年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产生过巨大影响。

[2]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金龙格译《青春咖啡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四、莫迪亚诺“记忆”书写的现代意义

莫迪亚诺不仅在他的国度、在瑞典学院受到推崇，享有极高声誉，在中国也同样拥有各种层面的广泛读者、受众，也有很多“粉丝”。据说，中国作家王小波和王朔都是莫氏的“粉丝”。中国翻译家早就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翻译出版过他的十余种主要代表作品，包括数种海外繁体中译文本。海峡两岸的台港地区和大陆中国知名的出版机构，如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出版过莫迪亚诺数种代表作，为汉语广大读者所阅读。作者其余所有作品的中译版权在获奖前即已全部被上海民营出版公司“九久读书人”买下，早已有译界行家精心译。至于我国法语文学圈内资深学者跟踪阅读莫氏作品者达四十年之久的，也大有人在，海内外都有。莫迪亚诺荣膺诺奖后，就有不少知名学者在我国重要报刊发表专论。我们相信，随着这位小说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发出的契机，他的作品便很快在拥有世界最多读者的中国读书界畅销，在海峡两岸汉语言读者圈广为传布，一如在他故乡那样，为最广大的读者所阅读、知晓、喜爱。这一点，理应是不足为怪也毫无疑问的。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和生命力是由其艺术创造性和创发力而决定的，而其创造本身又与他出生的时代和经历密不可分。莫迪亚诺在斯德哥尔摩获诺贝尔文学奖答词中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真切地坦承，他“和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是战争的孩子”。因为他出生在巴黎——“这噩梦般的巴黎”，他要感谢这个“被纳粹占领的巴黎”为他的出生地。对他来说“被占领的巴黎是一个创世之夜”：“我就是从那个黑夜里生出来的。这个巴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追踪和纠缠，而我的一本小说也就常常沐浴在它的隐晦光线里。”^[1]他从自身创作感受和亲历验证强调指出，一个作家的出生城市、“出生年月和那个时代会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会给他烙上终身不灭的标记。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城市就成了小说家的领地，其中有些伟大的小说家都只和某个城市紧密相关：巴尔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风（Nagi Kafû）和东京，亚尔玛·瑟德贝里（Hjalmar Söderberg）和斯德哥尔摩”，而他本人“则属于受这些小说家影响的一代”，^[2]一直在追随这些伟大小说家的榜样，以其出生地所在的城市为自己的创作背景、主题和灵感的。当我们悉心研读莫迪亚诺的主要代表系列小说作品，再静心聆听过他在庄严的诺贝尔文学奖台上上述这番袒露胸臆的真实表白，就不难看出莫迪亚

[1] Patrick Modiano, 2014,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coll. «Blanche», 2015 (ISBN 978-07-01906-3).

[2] Ibid.

诺和这些先驱大师们在写作渊源和创造灵感方面的师承关系，即他们的文学（小说）生涯都与其出生地的城市密切相关，无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命运、城市往事相依相存，成为他们所相同的写作最初源动力和时空坐标。因而我们在这里也就不难看到，莫迪亚诺和这些前贤大家之间的薪火相传、基因相承的亲密关系和时代意义。当然，莫迪亚诺亦坦言：“即使一个作家和任何其他艺术家一样，紧密地联系着自己的时代，以致无法摆脱，他呼吸到的唯一的空气都是时代精神的空气，但他总能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出一些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东西。”^[1]细读小说家莫迪亚诺书写的作品，我们就不难清晰地看到、品味到他的作品表达了某种“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东西”，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法国小说大家“超越时代”的某种永恒的经典价值，他以“记忆艺术”深刻的哲理寓意魅力和被占领的“老都城”巴黎往事的形象——令人战栗、“令人心碎”的文学形象，向世人昭示：忘记“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历史身份、忘记过去、忘记历史的记忆，便是背叛。他在作品中用没有人用过的诗意描绘来追忆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往事，字里行间流淌着缕缕绵长的愁绪，笼罩着前世今生的乡愁，旨在告诫他的读者们：要记住过去、记住历史、记住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乡愁，这是东西方当代有良知的知识者的一种时代使命、一种义不容辞的天职与历史担当，这从而使读者的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认识到莫迪亚诺书写“记忆”的现代意义。

因着瑞典老友迈平的热心引介而受益于博学的贺拉斯院士之点拨、引领的机遇，在初诊身患老年痴呆症、健忘症的半年有余的养病中重读 2014 年诺奖得主莫迪亚诺“记忆”系列作品，又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的今天，读罢这位出生于 1945 年的法国“记忆艺术”小说家的作品，抚今思昔，掩卷深思，倍感这位小说大家书写“记忆”的鲜活、深邃的现实意义，更领悟到他之作品确有“一些超越时代的東西”，某种永恒的价值意蕴。如若再联系到其先驱大师普鲁斯特，联想到笔者所熟悉的与他同时出道而先他获诺奖的勒克莱齐奥（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就和朋友许钧先生联手，率先在我国翻译出版过他的《沙漠》（*Désert* 中译《沙漠的女儿》）作品，以及我国读者无不知晓的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乃至新近笔者所读到的瑞典前诺奖评委会主席、著名作家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k）的长篇小

[1] Patrick Modiano, 2014,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coll. «Blanche », 2015 (ISBN 978-07-01906-3).

说《失忆的年代》^[1](我有幸刚刚读到万之译介赠读的中译本),我认为,所有这些作品,虽然出自不同的社会时代、处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出自不同时期、不同种族作家笔下、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不同层面地表达了某种“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乡愁”,而具有相似的主旨与主题。从这一角度看,笔者认为,莫迪亚诺、勒克莱齐奥、普鲁斯特、莫言、埃斯普马克都是非凡、值得尊敬的伟大艺术家,因为他们的创作展示了这一具有永恒的、普世性的价值意义的文学主题,并以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和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召唤读者、打动读者,告诉他们勿忘自己的身份,勿忘过去,勿忘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乡愁,从而富有鲜活、现实的警世性意义。

2015年8月2日,凌晨,于秦淮河西跬步斋

[1]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著、万之译《失忆的年代》(*Glömskans tid*),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该著被瑞典媒体称为“二战以后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社会批判性的展示”。作者为这个时代选择了7个关键词: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复仇、欢乐,构成了7个故事、7个主人公,为当代瑞典社会的见证人。这部鸿篇巨制甫一问世,便被外国文学评论界和我国当代知名作家誉为“卡夫卡式的寓言”、“加缪式的荒诞”与“洞见”、“史诗般的长篇巨著”。笔者有幸读到万之先生赠送的题签精装本,受益匪浅,顺致感谢。